

海洋思维：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

—— 评杨国桢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

王 日 根 宋 立

提要：本文对“海洋与中国丛书”及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丛书涉及了福建海洋发展史、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等领域，勾画出中国海洋开发利用中的成就与艰辛，也构建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板块。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课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说明了研究和开发海洋的重要性。

21世纪是海洋经济独领风骚的世纪，从把海洋视为“畏途”到“旅汪洋如坦途”，人们实现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飞跃，这其中包含了无数社会进步成果的结晶。如何科学地总结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以便为下世纪人类开发利用海洋服务，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致力于此已逾十载，他曾在报刊上积极呼吁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并就该学科的范畴、框架提出了总体构想，并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作为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方向，广纳来贤，撰写系列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学科建设的实践。江西高校出版社把这一研究的第一阶段成果组合为“海洋与中国丛书”推出，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并在国际海洋年出版首批四册：杨国桢著《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欧阳宗书著《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陈东有著《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曾少聪著《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第二批四册也即将出版）。杨先生在“总序”中说：“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深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海洋社会人文资料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值，力求有所突

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份绵力。”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

冷静地体察学术史，积极参与思索现实问题与热点问题，以务实的态度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回答学界和社会亟需澄清的问题，是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成功和备受关注的重要条件。

杨国桢先生过去的主攻领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等方面已取得系列研究成果。自 80 年代末期起，他不满足于沿着传统做法开展研究，把眼光转到海洋史的角度，这或许由于生活在沿海环境中，或许也包含了他对当时热烈讨论中的“黄土文明”与“蓝色文明”的独立思考。在探究中他逐渐认识到：海洋史研究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被付之阙如，在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天圆地方”的观念意味着对海洋的漠视，某些统治者视海洋为“化外”，为“水之汙”，或称“水沙漠”，可以视而不见。于是，正统学术中绝少有关海洋史的推究，即使有一些有关海洋的描述，也大多谬误百出，贻笑大方。有些人便因此用西方近代海洋文化的概念否认中国海洋文化的存在，提出“大海，在中国没有主体”^①。实际上，中国海洋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只是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文化”的行列，但在沿海民间社会，有关的口碑资料、习俗和传说却向人们呈现出丰富的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信息。也有人用“海洋农业文明”来概括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②。杨先生则认为，西方近代海洋文明与东方传统的海洋文明，不具有可比性，而且，以西方的指标评判东方，亦不免落入西方中心论的俗套。他提出：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海洋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观念，它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固定的模式，但呈现出不同的层次，隶属于不同的经济形态。最初，海洋经济只是与陆地经济在空间地理上的有所区别，即“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式的传统海洋经济。近代海洋经济则以海洋商业贸易和海外殖民为主要内容，而未来的海洋经济将以海洋三维空间资源开发为重点，以高新技术为发展动力，并从索取利用型向保护增殖型转化。过去的国家可以是封闭的，而如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于国际影响之外。倘若我们同意把 21 世纪看成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世纪，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海洋经济，不得不思考如何去面对海洋经济的问题，在世界舞台上求得自己的生存之地。在这种思考中，他深深体会到在我国加强海洋史研究

① 倪健中、宋宜昌主编《海洋中国：文明重心东移与国家利益空间》第三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9 页。

② 宋正海：《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7 页。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海洋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具体实施海洋史研究时,杨先生充分考虑了自己的学术积累,又注意把握海洋史研究中的重点,在《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未刊)一文中提出了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构想。他认识到建构该学科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强调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必须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并把海洋经济界定为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以求既融会自然科学成果,又不失对社会人文的关注。这一界定涵盖了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的时段,具有普遍意义。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活动,都是海洋经济。从而排除了沿海经济和海岛经济中的非海洋性经济成分。关于“海洋社会”,杨先生认为它“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并特别指出:“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必须把海洋发展作为国策,有向海洋开放的经济社会文化运作系统。比如英国,是近现代的海洋国家,一度是全球最大的海洋国家,但在古代并非如此,只是一个相当闭锁的岛国。中国在宋元和明前期,可以算是一个海洋国家,但后来官方从海洋退缩,丧失海洋国家的地位,而迟到本世纪80年代,海洋发展成为基本国策,才重新跻身海洋国家的行列。”说到“海洋文化”,他认为海洋文化是和陆域文化相对应的人文类型,但海洋文化可以呈现出不同模式,本身并无优劣高低之分。他认为,把史籍中的“以海为田”的“田”理解为农业,是传统农业思维观念所致之失误,实际上如“以海为田,滨海之人渔佃为生”,“以捕鱼为业,海即其田也”;“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蕃为命”中的“田”都不是指农业,而是指赖以谋生之业,实是指渔业和商业。基于这些认识,杨先生跨越传统史学的界限,开始了建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历程。

杨国桢先生设计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总体框架,包含了海岸带开发史研究(包括临海地理、港湾、洋流、潮汐、风候的认识和利用,荡地的农业与非农业开发,港口、港市的盛衰等)、岛屿带开发史研究(包括岛屿的发现和利用、农业与非农业开发等)、海洋国土开发史研究(包括海洋捕捞、海水制盐、海洋交通、海洋气象、海洋资源的了解和利用)、海洋贸易史(包括近海贸易与远洋贸易、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海洋经济圈内相关国家或区域的贸易互动、商品流通与管理等)、海洋移民史(包括中国境内的海路移民与海外移民、海洋移民的回归或反馈等)、海洋社会组织变迁史(包括渔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移民社会及海洋活动产生的各种血缘、地缘、业缘、神缘组织,海防、海军、港务、海关等政府管理组织等)、海洋社区发展史(包括沿海地区、岛屿等面向海洋发展的陆地社会经济变迁,“外向型”经济的成长,乡村的城市化等)、海洋科技史(包括渔具、渔法、造船与航海技术、海洋自然灾害防治、海水和

海底资源开发技术的演进等)、海洋政策演变史(包括国家的地方性的海洋政策、法令的制定或废止,政策变动对海洋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海洋思想文化史(包括海洋意识、海权观念、移民思想、海洋性风俗信仰、海外知识等)等十个研究方向^①。这显然是一个宏大的研究框架,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无法一蹴而就。因此,他要求弟子各择其所擅长,从不同研究方向选取一个子课题,以明清时代这个中外海洋发展道路出现歧异的时期为中心,进行具体研究,做学术积累工作。罗一星博士选取沿海乡村城市化的课题,出版了《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刘森博士选取沿海荡地开发的课题,出版了《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杨先生和孙谦博士等合作,还出版了《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此次首批出版的四本书分别涉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总体框架中三个相互关联的课题,又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在这套丛书中,杨国桢先生的《闽在海中》是对福建海洋区域的全面研究,构建起此套丛书所研究各方向的总框架,涉及经济、航路、移民、社会、人物五个方面。本书要旨可总结为:闽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沿海的闽人以海为田,闽西北的人们亦从容地走向大海,他们不仅在沿海走南闯北,而且更远涉东、西洋,谱写了一曲曲认识大海、开发海洋的历史华章;汉人入闽适应了海洋环境,为中国海洋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6世纪以后,在西方海洋势力东进的大背景下,福建的海洋活动又滋养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文明因素,步履维艰地向近代转型;闽人在开发海洋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俊彦,为福建海洋文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明代沿海城卫本是为了海防,其中有积极意义,但其对沿海人民出海捕鱼、贸易的查禁,却从客观上使中国丧失了走向近代化的机遇与动力。

欧阳宗书博士的《海上人家》是想通过渔业这一最古老的海洋产业的演进窥探海洋文化的变迁:“在海中”的闽人把海洋渔业作为自己的最初生业,并随着科技的进步,逐渐实现着从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的跨越。渔村人家在发展自己事业的过程中,闯过了无数艰难险阻,其中包含政府的弊政、官吏的贪渎与官员间的相互倾轧,渔民社会时常遭受劫难,渔村人民只能在夹缝中坚韧地为自己开辟前行的道路。

陈东有博士的《走向海洋贸易带》把人们的视野从大陆带进了海洋,侧重研究和检讨了商人行为: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被动地纳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从内陆走向沿海的商人与沿海部分海上人家一道,扬起高樯,劈波斩浪,加入到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贸易互动之中,海洋成为中外互市的舞台。利润的递升驱使着人们不断延展贸易半径,从而形成内层贸易带、中层贸易带和外层贸易带的纷繁景象,这其中有中

① 以上均参见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国本土沿海口岸之间、沿海口岸与海岛口岸之间的贸易,亦有中日、中菲、中泰之间的贸易,许多商人面对的则是大鼻子、蓝眼睛的欧美商魁。贸易激发了沿海商人的冒险精神,也促成了血缘、地缘等社会组织的凝聚,培养出海洋人独特的神灵信仰。对于这蓬勃、充满生机的海洋经济行为,明清政府曾首先着眼于政局的稳定而厉行海禁,但一方面因为海上贸易已形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一方面又因为海利既可充实国库,还可填塞贪官们的欲壑,时常在清官和贪官那儿都有支持者,因而海禁政策或在欲挽王朝于即倾者的倡导下被放宽,或在贪渎官员的懈怠中被打折扣。海禁的时严时宽、此严彼宽,事实上并没有彻底压抑住海上贸易的发展。在厉行海禁之时,也会出现许多行政管理上的薄弱环节,正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展起繁荣兴盛的海上贸易私港。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地方利益的争夺也足以激励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在此背景下,东南商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模式。

曾少聪博士的《东洋航路移民》则择取过去学界较少重视的东洋区域:既然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造就了东南沿海特殊的海上贸易模式,特殊的海上贸易模式又决定了东南沿海人民独特的移民方式,他们或移居海岛(如台湾、海南岛),或移居东西洋,移民这一社会行动负载了如移出地、移入地的社会经济条件、移民目的、移民政策、移民经济活动、移民社会的结构、移民的文化接触等诸多社会内涵。这诸多社会内涵的差异往往决定了移民社会中的诸多独特景观。比较移民台湾与移民菲律宾的异同便也成为推动移民史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首批出版的四册彼此关连,从在海中的闽人扩展到沿海地区的人们,从沿海又走向远海,从传统的捕鱼行业发展到与世界市场建立联系,开展商贸活动,并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其中展示了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度层次,也勾画出中国人海洋开发利用中的成就与艰辛,从而构成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巨大板块。

二

研究角度的转换与视野的开拓,使作者们体悟到了诸多为前人所未发的机理,某些方面则证实或否定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可以说,海洋社会经济史阶段性研究已开启了重新审视过去历史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新途径,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也凸显出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杨国桢先生是在不断加深对开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意义的认识的基础上推进研究的。他在这套丛书的《致读者》中说:“福建海洋发展在历史漏斗中留下的记录,只是少数为主流社会所关注的事件和人物。老百姓海洋活动的历史大多被淹没,只有一部分成为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传统传承下来。它们既未走入学术殿堂,是非主流文化,因而也绝少为学者所阐扬,鲜为世人知。”显然,他的追求就在于确立这种非主流文化

的地位，彰明这种非主流文化的脉络，从而思索它，批判地总结它，乃至张扬它。凭借着这种学术的固执所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已显示：第一，中国海洋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海洋发展模式经历了不同阶段性的转换，即由海洋捕捞型向海洋运输、海洋商业型的转换，由官方海洋活动向民间海洋活动的转换。这其中，中外经济形势、政治形势都是促成这类转换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中的地域差异，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曾相互整合，彼此交融。中国文明在远古时代就与环太平洋文化有了互动，周秦、汉唐，中央欧亚草原（从中国的东北到欧洲的匈牙利）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大动脉，而南海交通也悄然兴起；宋元以降，西欧“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中国主导的东亚传统海域圈（北自日本、朝鲜，南达东南亚诸国）与阿拉伯人主导的西亚传统海域圈互动，形成“海上丝绸之路”；明清中外海洋势力在南中国海接触和碰撞，海外移民潮不断成为国际移民中一股强劲的力量。这些说明中国人并非只是“望洋兴叹”，而是有所作为。事实上，中国比西欧更早环抱海洋，有自己的传统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①。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过农业部族和海洋部族争胜融合的过程，中华古文明中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在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王朝体系形成之后，沿海地区仍然继承了海洋发展的地方特色。在汉族中原移民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强盛的传统农业文明吸收涵化了当地海洋发展的传统，创造了与北方传统社会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南中国的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基因^②。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在明中叶产生局部质的突破，源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趋势和历史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海外移民潮是被海洋经济特别是私人海上贸易牵动的，这就使得海外移民区域和传统亚洲经济圈重叠在一起，海外移民社区一般也是中国海商的落脚点和中转站，中国海商也因压冬住番成为暂时的商业移民，甚至有数十年长期寄居者，因而使海外移民社区和中国海洋经济活动存在稳定的联系，成为中国海洋商贸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海洋移民在当地开辟的商贸网络，是中国海洋贸易的主要海外市场^③。不过，由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出现，是社会与政治震荡在经济方面的客观因应，而不是执行国家海洋政策的主观效果，故从一开始就只能在传统经济的夹缝中顽强地寻求有限的发展空间，造成主体发展上的民间自发性和地方区域性特征；复因内陆传统农业文明的强势，明清两代统治者漠视海洋发展，一再地加以限制和禁止，海洋经济因素未能纳入传统经济体制内进行循环运作，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造成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实质意义的脆弱，在国际贸易形势变化、产业技术结构变迁、市场消费结

① 《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参见杨国桢《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参见《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第204—205页。

构变迁等经济形势下,无力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以致在国际海洋竞争中最终失去了对抗优势。海洋经济意识始终局限于沿海的民间层次,而难以向内陆推进和转化,更不可能对内陆中心体系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而迟缓了中国政治权力对海洋的开放和传统官僚体系的近代化。近代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形成沿海殖民地经济与传统模式的民间海洋经济并存的格局^①。这便形成了以海洋角度观照中国历史的崭新思路,否定了传统的视明清时期为中国海洋发展的黄昏时期的观点,认为明清时期恰恰是近代海洋经济的萌芽期。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南沿海区域海洋经济的推助。第二,杨先生不是把中国海洋文化成分诠释为“海洋农业文化”或提出创建“沿海学”,认为这样做,“中国的海洋性传统”都未得到应有的呈现,它们仍然未跳出传统农业主流文化思维的模式,甚至实际上是否定中国海洋性传统的存在。他认为,海洋社会的行为模式与陆地社会(农业社会或游牧社会)有显著的差别,政策导向和管理方式、价值取向也不一样,海洋社会与海洋经济的兴衰相适应,有不同的层次。最初只是个别海洋沿岸地区和岛屿上的生产生活群体,进为一定海域的“渔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海洋移民社会”的组合,再进一步发展为面向海洋的开放性社会体系,形成“海洋区域”(以海洋发展为社会驱动力的海洋沿岸地区、岛屿和海域)和“海洋国家”(以海洋发展为国策的海洋沿岸国家或岛国)。他进一步指出:“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概念和内涵是变化发展的,多层次的,因而不存在固定的模式,海洋沿岸国家和地区,不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有产生和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可能,都有依据自身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塑造的海洋文明,这样的理解比较贴近真实的历史,是世界多元化、多样化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第三,中国海洋社会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基本成分,与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只是在传统时代它受强势农业社会经济的控制和压抑,滞留在民间性、地方性的层次,对陆地经济社会的辐射力有限,但在农业社会经济衰落的时段,它经常显露出活力,补强中国社会经济,是农业社会经济“大传统”下的一个“小传统”(“次传统”)。由于这个“小传统”的存在,才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根本转变提供了驱动力,并不断加重自己的经济能量和社会能量,迈向现代化。因此“把海洋社会经济视为独立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之外的‘异己力量’,即不承认海洋社会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基本成分,或视海洋社会经济为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内的‘分离力量’,即夸大海洋社会经济与农业社会经济、游牧社会经济的不可兼容性,都是学术意识和研究实践上的‘错位’。”他反复强调民间传统,强调海洋社会经济与大陆社会经济并非对抗得不可兼容,突破了过去传统官方史学的局限。第四,杨先生觉得仅注意制度史的研究,而忽视制度具体实施的效果,依此所做的研究存在缺失。他认为:“海洋政策的开放或封闭与海洋社会经济的

① 参见《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序言”。

开放或封闭并不是一回事。明代的海禁政策是明朝海洋政策的倒退，但实行海禁时期东南沿海的海洋社会经济以非法的、民间的方式崛起；清前期实行海外移民禁令，严办出洋久留或逾期不归者，但马六甲中国移民的数量却直线上升，都是明显的反例。只看海洋政策的开放或封闭趋向，不看海洋社会经济的具体因应，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需要把握这对矛盾的辩证关系，跳出海洋政策演变的层面，着重考察海洋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加强对海洋社会经济变迁（正常发展或扭曲发展）的研究深度。”又在具体的研究中提出：或许可以说，明中后期海乱是日后海岛与海洋文化提升的一个机缘，海岛海洋地位的提高与海洋文化的趋重为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传统历史文化主流之外的回旋空间，从而增强了社会精神对于海洋的体认。由此，“明中后期东南沿海社会在高层政治思想与基层意识方面都显示出一种转换的趋势，种种社会潜因促致沿海民间社会向海洋发展形成潮流，使沿海这一海陆交叉地带的‘大陆——海洋型’社会开始从内陆主流体系向海洋文化体系倾斜；防禁不逮与西方海洋势力冲击更为中国的海洋发展创就了历史性、世界性的契机，时代演进潮流和需求孕育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从低级向高级转型的因素。”^①第五，杨先生在张扬民间海洋经济传统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予以全盘肯定，他理性地认为，中国海外移民的商贸网络是以小资本、分散经营的民间经济组织为基础的，它适合中国海商个体走私性的经营方式，具有传统的惰性，不能刺激甚至延缓大规模企业经营的产生，而对中国海洋贸易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当海外商业环境变化，欧洲商人不再主要依靠中国海外移民的商贸网络取得中国商品而采取直接经营的手段时，中国海商的落后经营方式便不是竞争的对手了。第六，对于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杨先生认为不宜过分夸大，整个明清时期亦并非全在实行海禁，在某些时段、某些地区都曾出于不同目的而有过程度不同的开放，这其中包含政府对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因应，其中有些官员也程度不同地从地方利益出发，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在有关明代海防的研究中也做了较过去更深入的分析，总结了明政府设置沿海防卫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指出这种政策的实行以及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蠹对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客观上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②。我们以为这类分析是切实和中允的，或足以启迪研究者的思维，或有利于克服过去诸多成见。

其他三位作者亦各有所开拓，如欧阳宗书先生的研究表明：明清海洋渔业已略具现代海洋渔业之雏形，“明清海洋渔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了‘上裕课而下裕民’的双重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龙头和驱动力作用。”^③陈

① 《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第 21 页。

② 参见《闽在海中》，第 164 页。

③ 《海上人家》，第 192 页。

东有先生总结说：在海禁政策实行过程中，因为官商之间权与钱的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央朝廷的某些限制和管制政策对中国与世界市场互动的消极作用。”^① 明清政府既注重商利，却又碍于对商人们的不安定性，惟利是图和富裕的生活以及由此产生观念上的反传统的恐惧，故在政策上总是体现为首尾两端、游离不定。政府对商人不但较少“顾恤”，反而多行打击之能事，这是明清海商无法发展壮大的关键原因^②。曾少聪先生则指出：“明清时期的海洋移民是世界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世界大移民的过程中，西欧列强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分别走上殖民主义的道路。与此同时的中国并没有进行海外殖民活动，它是走民间自发的移民道路，与移居地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这与中国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③。在对移居国内台湾岛与移居国外菲律宾的比较中，作者认为：在家族结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亦与移民对传统文化和移居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因应密切相关，如家族组织可以为抵御外患而建立起来，血缘的纽带有时也完全可以被冲破，根本目的多在于适应环境，谋求发展。这些具体的细部研究都能留给人们切实的感受。

三

多学科结合与广泛利用各种资料是该丛书的又一显著特色，也指明了进一步深化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努力方向。

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是一门集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海洋学等多学科知识的边缘学科，必须借助于“科际整合”的手段，实现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从首期出版的四册书中，我们已可明显地感受到人文研究的整合倾向。杨国桢先生在潜心思考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诸多范畴时，已跨越了以上所说诸多学科的界限。近代我国历史学长期以来不断收缩自己的研究领域，逐渐变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分割的条条框框，而海洋史研究则有利于克服这种缺陷。海洋史研究的深化，将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诸学科如生态学、环境学、海洋学、气象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实现古今中外历史研究的全面贯通。应该说，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仍然是初步的，史学工作者面对着一个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知识结构的任务。杨先生说：我们的研究必须从细微处着眼，但切切不可缺乏宏大的视野和全面的知识积累。我们不宜使历史研究琐碎化，而应该多做些深入的思考，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寻求历史发展的真谛，求得读者与社会的认同。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

① 《走向海洋贸易带》，第 313页。

② 《走向海洋贸易带》，第 328页。

③ 《东洋海路移民》，第 228页。

本丛书中的另外三位作者都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在加深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他们原来各自的专长都能有效地被整合进各自的专题研究中。譬如陈东有先生利用明清小说作为证史资料，弥补了史籍中对民众行为、观念记载的缺失，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曾少聪先生利用语言学研究成果分析海洋移民的文化接触，亦显示出“科际整合”的优势。杨先生为了推进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而把这些不同学术背景的学子凝聚在一起时，本身已产生了开展研究的新优势。作为博士生，他们富有流动性，这就使得这个学术团体具备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其次，不同学术背景的学子因为选取了相互关联的子课题，易于举行学术研讨，形成共同关注的热点，易于集思广益，相互启发，深化研究，这也体现了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集团化作战的优势。

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把较多精力用于收集各种民间资料上，这是由该学科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本丛书的各位作者都注重广辟资料来源。古代典籍和散藏在海内外的民间资料都得到有效利用。杨国桢先生充分利用自己客寓英国的机会，广泛收集了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所藏有关文献资料，另外他还大量收集民间的实物史料和口碑史料，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具体可感，别具深度。在《闽在海中》第141页中，通过对张化孙遗迹的探寻他总结道：“张化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张化孙裔孙播迁开发闽粤台的历史，是一段普通老百姓从山区跨越海洋垦殖的历史，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是普通百姓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的，在草野民间，蕴藏着多少普通老百姓的传说轶事，值得人文科学家们去挖掘利用，民间的文献和遗物、遗俗，是一个大宝库。我想，学术界对于这一大宝库都会见之动容的。”在实践中他体验到了田野调查及探究民间社会历史的无限乐趣。曾少聪先生也充分利用自己多次出访菲律宾的机会，结合文献采集与实地调查，把过去被学人视为只有较少史料的课题研究得有声有色。

杨先生早年师从我国老一辈史学家傅衣凌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深得傅先生注重多学科整合、注重挖掘多方面史料等研究特色之真传。在此基础上，他又冷静反思了我国史学发展的路径，实现了从传统的大陆史观向大陆与海洋史观并举的转变，还了过去一向被忽略的海洋史应有的地位，改变了过去仅重陆地史研究或把沿海地区看做陆地的延伸的偏向。他所做的努力符合世界史学潮流，具有比较世界史的视野，也不乏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其发展前景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有了良好的阶段性收获感到高兴，亦呼吁有更多的同道加入其中，进一步推进这一领域内各项课题研究的深化。

〔作者王日根，1964年生，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宋立，1953年生，副教授，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361005〕

（责任编辑：仲伟民）